

赵汀阳 贺照田 主编

第一辑

学术思想评论

辽宁大学出版社

学术思想评论

(第一辑)

主编 赵汀阳 贺照田

辽宁大学出版社
一九九七·七月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学术思想评论/赵汀阳，贺照田主编.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3

ISBN 7-5610-3351-6.

I. 学… II. ①赵… ②贺… III. 社会科学-学术思想-思想评论 IV. C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1029 号

学术思想评论 (第一辑)

主编 赵汀阳 贺照田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崇山中路 66 号)
新华书店经销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7.5 插页：3 字数：400 千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500 册

责任编辑：刘 
版式设计：李 

封面设计：小 羽
责任校对：东 篓

ISBN 7-5610-3351-6
C · 80 定价：28.00 元

为了学术与思想的深化

李致林題

前　　言

最重要的问题都是现实问题。因此，我们希望通过《学术思想评论》实现一种关涉现实的思维方式，要求在思想学术讨论中能使人们看到一些试图解决问题的做法，而不仅仅是一些对事情的看法，或者说，要多一些思考，少一些表态。

无论在《学术思想评论》的专题讨论中还是在书评中，我们要求作者首先要进入问题并且就事论事地进行分析和提出设想，我们相信这才是读者真正需要的。在这个时代里，看法已经过剩，已经足够多元，已经足够大同小异。“事情该怎么看”变得相对次要，“事情该怎么做”成了更重要的问题。因此，我们不打算让读者在《学术思想评论》中只看到“你赞同这种看法而他不赞同这种看法”这类趣味性表态，而将努力使读者能看到“这种设想在某一点上有困难，可以有这样一种改进，或者可以有另一种更合理的设想”这种意义上的讨论。这就像对棋局的评论，说出这一步下得好还是不好，不算是评论或研究，你必须说出如何不好和什么是好的。没有证明的东西不存在。那种以情感和趣味代替思想，以废话和废料堆砌学术的行为已经

损害了思想学术这一概念。

除了相当篇幅的书评，《学术思想评论》设有两类专题讨论，一类是“思想性”的，一类是“学术性”的。这种区别仅仅意味着讨论方式的不同，不是说它们是分离的。事实上，经过充分讨论的思想就会产生学术问题，而真正的学术分析必定具有思想水平。在每个专题讨论中，都将就某个特定问题展开深入的多方对话。我们不把“对话”理解为多种意见互相增进了解的过程，而是理解为从多种意见去对同一个问题产生影响，或者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改变这个问题，或者明确需要考虑的相关问题。我们想展示的不是“如此多”的意见，而是值得多方努力的问题。

《学术思想评论》的书评在选题上无限制，但要求它是相当于学术讨论的文章，那种自由联想式的书评对于《学术思想评论》来说将被视为不合适的。

另外，也将设有关于思潮和动态的评论以及学者自述。

我们希望《学术思想评论》能代表一种健康清醒的文化行为，一种有实际意义的文化操作，并且希望它能促进人们的独立思考，更多地思考实际存在着的问题，尤其提倡一种就事论事、清楚明白的讨论方式。

这就是我们想做的事情。

目 录

前 言

学术现象论析

——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学术

- 叶秀山：“思潮”与“学术” (1)
徐友渔：学术范式的转换 (8)
周国平：圈外人的臆想 (22)
何光沪：门外谈学 (29)
赵汀阳：文化实力 (40)
陈少峰：在学术内外

——关于人文学术研究的基本规定性

..... (44)

- 舒 烨：个人感触 (50)

专题

——不含规范的道德是否可能

- 赵汀阳：不含规范的伦理学 (52)

梁治平：《不含规范的伦理学》一文中 的两个悖论	(69)
周国平：伦理学和价值层次	(77)
何光沪：最高目标和最低规范 ——一位非伦理学者对一篇非伦理学论 文的苛评	(83)
刘军宁：美德与黑暗时代	(120)
苏晓离：含合理规范的伦理学	(135)
张盾：伦理学的另一种可能性	(167)

专题二：

——从创作批评实际提炼诗学问题

西川：生存处境与写作处境	(180)
程光炜：九十年代诗歌：另一意义的命名	(200)
肖开愚：九十年代诗歌：抱负、特征和资料	(215)
欧阳江河：当代诗的升华及其限度	(235)
王家新：奥尔菲斯仍在歌唱	(252)
唐晓渡：五四新诗的现代性问题	(262)

学者访谈：

转型时期的文化建设

——陈来先生访谈录	(273)
-----------	-------	-------

阐释与分析

- 刘光耀：**语言与逻辑：通向上帝之思的思
——何光沪《多元化的上帝观》
试读之一 (283)
- 周晋：**读《有无之境》兼论“定性书”
..... (305)
- 李河：**从“应当”到“能够”的实验
——《良心论》读后 (316)
- 王炳文：**胡塞尔的超越论的现象学及其他
——《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译后记 (346)
- 章建刚：**经济伦理学的必要性和资本主义道德基础
——读科斯洛夫斯基的《资本主义的伦理学》 (373)
- 伯恩施坦：**实用主义的复兴 (383)

学科与学术史

- 黄卓越：**传统文论研究的现有格局与学术
思维调整 (407)
- 钱志熙：**人文关怀与审美体验
——对文学史研究现状的一点
反思 (421)

- 杨立华：历史研究的“造境”与“写境” (428)
- 西 川：贴近创作本身读解 (435)
- 张 帆：元朝的特性
——蒙元史若干问题的思考 (457)
- 周绍泉：徽州文书与明清社会史研究 (481)

术语精义

- 毛崇杰：新历史主义 (490)

序，跋

- 刘 东：《经济与文化——韦伯问题再探索》
序 (495)
- 赵 园：《赵园自选集》自序 (502)

学术经验

- 何怀宏：一个学术的回顾 (510)

学术现象论析

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学术

叶秀山

“思潮”与“学术”

——十世纪快速过去，我们面临着新世纪的到来，在我研究的西方哲学领域，思前想后，我有一个大概的印象，特别是对欧洲大陆哲学，可以说我有一个自己的看法，但对我们自己的哲学学术情况，却说不出多少话来，应了那句俗话，叫“说别人容易，说自己难”。

我们自己的学术情况，可以追溯到1949年，也可以再往上追，当近、现代中国哲学学术的特殊情形，再往上，可以直接中国文化历史的大传统，这本身就是一个历史性的大题目，做起来当然更难。现在，我们只着眼于改革开放以来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这十多年的时间，谈一点非常肤浅的感想。

回顾一下八十年代的学术界，其活跃的局面总是令人鼓舞、

兴奋的。那时中国的社会从“文革”的压抑和阴影中解脱出来，百废待兴、百废俱兴，思想活跃的程度，是多少年来没有的，的确是百花争艳的景象。

在这种活跃的场景中，最为突出的是西学在中国的再次受到重视，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改革开放的社会，面对的是一个更为广大开阔的天地，随着政治、经济的交往，学术文化的交流日益增多，在思想学说上也竞相“引进”西方的各种新老学说，一时间尼采、萨特、存在主义……成为哲学文章中常见的名字，随后也有一些专门的著作问世，在不同程度上提高了这种“引进”的学术水平。

时间进入九十年代，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大势头在继续向前发展，但具体的情况有所不同。就学术界来说，由“引进”西方的学说，进入更加侧重弘扬、反思中国国有的传统文化，于是有“国学”的再次提倡。之所以形成这个趋势，我觉得是有多种因素促成的。一方面当然是政府领导的倡导，在弘扬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旗帜下，许多传统的学问得到复兴。就学界自身情形看，我们扩大了交流的范围，也有一定的关系。90年代以来，我们加强了与台湾的民间交流，与经济的相互吸引同时学术文化交流逐渐增多，而在这种交流中，中国传统文化，显然是最为重要的基础和纽带，再加上香港、欧美的华裔学者，连同韩国、日本的学者，都在中国传统这个领域，找到了共同的题目，中国的各种传统学问，成为九十年代的显学，而西方哲学的“引进”和“研究”，相对地就不如八十年代那样热闹。

应该说，无论八十年代的“西学热”，或现在九十年代的“国学热”，对我们这个民族思想文化今后的发展都是有益的，尽管对这两种“热”都有来自不同方面的批评。我想说的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

既然叫“热”，我想是指有了一定的“流行”的程度，才

“热”得起来，而“流行”的“热”主要是一种社会的“思潮”，而不局限于“学术”。“学术”一般“热”不起来。

我们做学术工作的，着眼点主要在于“学术”。当然，“学术”不是说与“思潮”没有关系，或者不重视“思潮”；恰恰相反，“思潮”是“学术”更广泛的基础，它可以推动“学术”，但它本身还不是“学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热”，其中也有不少有学术份量的研究作品，但也有不少学术上软一点但社会影响大的作品。“思潮”与“学术”有深刻的内在联系但又各有各的作用。我们做学术工作的，希望借助“思潮”的力量，来提高我们工作的社会效益，和自身的社会意义，也希望把“思潮”中涌现出的问题，作更加深入的学理上的探讨，提高和深化这些思想的学术水平。

譬如，九十年代以来，研究西方哲学的，沉静下来了，我们不仅进一步研究了萨特，我们还研究了海德格尔，还有研究了胡塞尔，从学理上研究多种学说的关系，然后我们对于“后现代”、“后结构”，在小热了一些日子后，很快就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我们对于现今比较活跃的法国哲学，也有了更多的了解和研究……当然，这些还远远不够，但毕竟不满足于一时的“热”，或只从某些眼前的社会需要出发，“引进”一些“耀眼”的新学说，而是沉静下来探讨它们的理路。这样，我们作为学术工作者，才能不仅仅限于谈论一般“思潮”，而进入到学术研究、学术探讨的深入层次。“思潮”的影响是广泛的，而学术的作用是深刻的。

只有深入下去，我们自己的独立的见解才能出得来，而丌只停留在“介绍”、“引进”的层面上，或发一些貌似新鲜但不着边际的议论。中国的学者，无论对于中国古代的学术或外国现代的学术，都应有自己的独立的、创造性的见解，我们要有自己的独特的学说，这是每个学术工作者都在追求的目标。学

术工作原本是创造性的工作；然而，我们自己的见解，应是有根、有据的，是深入研究、思考的结果，而不是凭空出来的。从“思潮”到“学术”，尤其是哲学性的学术，当然要强调“思考”，但“想”总要“想”些“什么”，这些“什么”的“材料”，是要“学”而后知的，更何况，你在思考，别人也在思考，要确切地、深入地了解别人——特别是大哲学家是怎样“思考”的，应是哲学作为学术的基本训练。哲学史上的确也有一些天才式的哲学家、思想家，只着重于自己想，而不大研究别人确切是怎样想的，或者有的学者发现，维特根斯坦在论述问题时，有的地方像康德，有的地方像叔本华，但又都不很确切地是，这是很特别的。维特根斯坦不是念了大量的书之后才出来自己的学问的，也不是钻研某些学派的学说后才出来自己的思想的，我想，这种天才式的人物是历史的特例。我们一般的人，有普通能力的人，不能完全以此为榜样；同时，我们也不必先把自己设定为那种天才式的人，早早就以此方式来工作，而不妨降一下格，先从普通的事做起，认真读书，认真思考，果有天才，总会发挥出来的。我甚至觉得，未来的开放社会，“天才”不容易被“埋没”，而倒容易“流产”。

近十年来中国人着重弘扬中国自己的学问，真是一件大好事。中国传统学问，过去长期以来也是处于被压制的地位，常常用“封建主义”、“唯心主义”这类的帽子来简单对待，所以，尽管中国学者对自己传统学问有着非常深厚的学养基础，这种天然的优势不是研究西方学问的学者所能具有的，但无论在继承和分析研究方面也还有一些问题，就“思潮”来说，需要自上而下的弘扬，而就“学术”来说，也有进一步加深的必要，因而就中国学问领域言，同样也有一个由“思潮”到“学术”的深化过程，不能因为我们有前人的深厚的学术基础，就掉以轻心。

在如今快要告别二十世纪的现时代，我们来弘扬传统的优秀道德文化，使之成为一种“思潮”，发生广泛的社会积极影响，或者深入进行“学术”研究，使之进入现代中国人的内心深处，的确要有个分析研究的态度。在一般“思潮”中，会泥沙俱下，而在研究“学术”中也有个方法问题。

有些学者认为，研究现代的中国哲学，离不开与西方哲学文化的关系这个问题，不能孤立地谈中国哲学的问题，我想这个意见是对的。中国的现代社会，总是在不同的方式下，或不同的程度上和西方的世界产生各种交流、交往，西方的学术文化冲击着我国传统的学术文化，我国传统文化迎接着西方文化的挑战，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大形势、大事实。这种文化上的撞击，加重了中国学者的任务：研究中国学问的，要懂得西方学问，研究西方学问的，也要懂得中国学问，而两边的学问都是浩如烟海，渊远流长，现今的学者比起古人来，有着双倍任务。实际上，我们的老师这一代学者，像冯友兰先生、金岳霖先生、贺麟先生等，都是学通中西、兼学中西的。

学术和生活一样，都有个“现代化”的问题。西方的学者也很注意如何对传统有一个新的、现代视角的阐释的问题。胡塞尔说，他的理念论正是说了柏拉图想说而没有说清楚的话，海德格尔也说，他要把古人想说而没有说清楚的地方说清楚。古人因为时代的限制，有些问题他们“感觉”到了，但没有“想”得很清楚，今人的条件变了，经验积累了，或现实生活某个方面突出了，有些问题的方面比古人的感受更深、更突出，“想”得也更多，因而可以把古人的思想阐发得更清楚。譬如希腊人也讲“自由”，但不很突出，算不上是哲学的主要范畴，但到了康德，“自由”则是他的哲学的“顶尖”概念。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哲学的反传统的势头越来越大，其实也是从“现代”的视角看“传统”的一种方式。就我研究西方哲学的体会来说，我

觉得他们的“传统”不断在“现代化”，而他们的“传统”也“经得住”“现代化”，“值得”加以“现代化”。

我想，我们中国学术的“传统”同样“需要”、而且“经得住”、“值得”我们去“现代化”它。中国哲学学术的确博大精深，比起老子的《道德经》来，“前苏格拉底”哲学真是“残篇”，而《易经》是一个天、地、人的大哲学体系，真正可以说是古代的“爱智学”。《论语》和柏拉图的《对话》，在哲学精神上不相同，但因儒家关于“仁”（以及与此有关）的学说，却蕴含了古代希腊人所没有、或未曾深究的人生哲理在内。我们甚至有一种感觉：在西方现代一些大哲人“反出”他们的西方“传统”之后他们提出了某些新思想，有些成了二十世纪西方哲学不同于上个世纪的特点，而在这个背景中来思考我们中国传统哲学的问题，竟会觉得我们的传统比他们的传统更接近现代。当然，并不是说说，我们的传统就已经是现代的，不需要新的阐发，而是说，我们确实可以从自己的传统中开发出新意来。

所谓“传统”的“现代化”，西方的学术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参考系数。中西哲学之交流、汇通、和合，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他们之间的交往，不限于一些外在的比较，找出表面的异同，甚至也不仅仅是简单的对话、交谈（各说各的），而是针对“问题”的相互的讨论、辩论。我总觉得，中西哲学、文化、学术固然有很大的差异，但所思考的“问题”在大的方面是一致的，不是风马牛不相及，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他们的思想，他们同样也可以“理解”我们的思想，在这个大前提下，双方对“问题”的“说法”（思想方式）上的不同，正可以互相研发，使对“问题”的“理解”更深入，更全面。

要做到对“问题”的深入探讨，就不能满足于“思潮”的热闹，还要做到“学术”的深化。“国学热”为深入探讨中国哲学、文化的学术工作开创了很好的局面，学术工作者要抓住这

个时机，使中国的传统学问有一个现代的、新的启发，要使西方的哲学工作者在思考哲学问题时，不能忽视或轻视中国（哲学）的“说法”。这不仅仅是个语言文字的障碍问题，德国人、法国人、英美人会从基尔克特用丹麦文写的著作中发现出新的意义来，相信也会从中文的著作中发现出新意义来。

从传统中阐发新的意义首先是我们自己的任务。我们的祖先为我们留下了如此丰富的文化遗产，总体来说是很对得起我们的，我们也要做对得起祖先的事。我们要使祖先的思想在现代也发出它应有的光芒，使他们的思想、“说法”，与现代生活融为一体，而不仅是在一定的时候“热”一阵了事。学术工作正是要把这种“思潮”的热度，保存、积聚起来，经过扎实、艰苦的思考、研究工作，使之成为一种深入持久的“力量”，随时都可以发挥出来。中国的哲学家承继着自己数千年哲学文化传统，对于哲学的“问题”，终归会有自己的独特的“说法”，届时中国的哲学家将更加辉煌地立足于世界哲学之林，对人类哲学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